

冰心儿童观及其写作意义辨

□ 林丹娅

摘 要: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萌时期广有影响的标志性作家,她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为现代女性的写作,所带给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性改变。通过对冰心儿童观来源与性质的考察,不仅可见组成冰心文学所特有的内涵与风格的重要元素,更可籍由这个特具象征性与代表性个案,考察中国女性写作的现代转型与其特质。

关键词:冰心儿童观;女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11-0114-05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萌时期广有影响的标志性作家,她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为现代女性的写作,所带给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性改变。在冰心文学所特有的内涵与风格中,有二个潜在元素及其关联性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即是被冰心称之为“梵”的信仰的文学化。冰心所说的“梵”,实际上就是她所偏好并着重强调的“调和”。那么,在无处不矛盾的现实世界里,用什么去调和,用什么去达到调和的目的,冰心从她自身的感知与体验出发,她几乎是毫无隔阂地接受了当时来自印度诗人泰戈尔所秉持的不乏乌托邦理想的“人爱”。这种不涉及男女异性情爱的“人爱”,从泰戈尔的诗中,可窥其具有浓厚西方式的民主、平等、博爱的哲学理念与文化背景。它与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仁爱”,从理论出发点到实践都有根本性的区别。

儒家之“仁爱”的基本涵义:它基本属于道德伦理范畴,是儒家标榜的做人修养与准则,是“君子”的人格基准,能成就一个人作为君子的名声。

而其基本核心是“孝悌”二字,“孝”是孝敬父母,“悌”是敬爱兄长。从而可见,儒家之“仁爱”的基本出发点与重心还是在于维护一种既定秩序,避免“犯上”,犯上就是作乱,就是不仁,就是非君子,就不会有好名声。唯此“仁爱”,才是君子的立身之道。

泰戈尔的“人爱”,则反其道也,它体现的恰恰是对在“仁爱”伦理秩序中位于“下”的孩子的重视,重视的是普通人的日常情感。两相比较,“仁爱”是属一种理性化、规矩化、社会化的道德伦理范畴,而“人爱”则属于情感性、自然性、个体性的人类心理范畴。自小就沐浴在西风东渐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氛围中的冰心,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泰戈尔式的“人爱”,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所以,虽然在教会学校受教育,但对基督其实并不特别虔诚的冰心,却让基督之博爱在这种中国式的境遇中,成为自己颇为牢固的文学信仰与言说主题,并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一直持守到最后。

一个即是这种“人爱”在文学化过程中所依托的艺术形象。如果说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着眼点是落在象征秩序永固的尊者长者身上的

作者简介:林丹娅(1958—),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话,那么泰戈尔“人爱”的着眼点就全落在象征着新生、纯洁、发展的孩子身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几乎没有以孩子形象作为崇高、完美、智慧、力量等等一系列象征人类理想化事物与境界的意象,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尊老轻少的伦理观有关。“孺子可教”中的张良,就是因其敬老行为才被视为有培养前途的,此例堪为典型。^[1]而乳臭未干,口黄未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等等家喻户晓的雅语俗话,反映的就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对年少者的轻视。孩子在封建伦理道统中总是处在无足轻重的、最容易被忽略掉的、甚而被牺牲的位置上。当孩子们的心灵不被呵护,行为不被关注,人格不被尊重的时候,母爱也就变得无足轻重,由此连带着正面表现母爱主题的,或借母爱为情感修辞手段的文学作品都少得可怜。有的只是孟母三迁、岳母刺字这类通晓大义、训子成才的“良母”形象,崇尚的是对小苗的捆绑与修剪,以使其符合成年人志趣的“成才”。如果说中国有母爱的话,那也只有被置放于教子“成才”的价值体系中它才是有意义的,才是伟大的。这种中国式母爱,鼓励理性取代感性,大义取代小我,没有这种理性与大义内涵的母爱,通常会被认为是溺爱,不仅没有价值与意义,而且还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中国式的母爱,早已被纳入成年人的道德成规与意志中,以此压抑、取代孩子个性的发展,自主性的抉择。如此摧残使之“成才”法,也是致使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精英们,喊出“救救孩子”的原因之一。^[2]

与中国传统在伦理、情感、审美诸层面上对“孩子”这个意象的轻视、漠视与缺乏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泰戈尔一直把孩子作为各种理想的寄托与化身顶礼膜拜,并于字里行间无不流溢出对孩子浓郁的慈母情怀,殷切关爱。与鲁迅在中国式的传统文化境遇中,从现实角度发出“救救孩子”不同,泰戈尔是站在理想之中,向来是让孩子来救救这个世界的。

如《飞鸟集》: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光明如一个裸体的孩子,快快活活地在绿叶当中游戏,它不知道人是会欺诈的;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带来信息说:神对人并

未灰心失望。

如《孩子的世界》: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我愿我能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脱了一切的束缚。

在泰戈尔的笔下,要么孩子成为万能的神,能够消除世俗的各种丑陋,拯救堕落异化的人类;要么孩子成为各种美好事物,包括美好品德、情操、理想的象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充分体现了泰戈尔对孩子世界由衷的羡慕、喜爱与推崇。其情由自然一则是与作者的慈爱天性有关,二则是与作者对成人/现实世界的失望与悲悯有关。而在此二者深处,则有一份作者深受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痕迹:尽管对以成年人为表征的现实世界不看好,但对人类的未来却充满希望。而人类的未来,人类的希望则无可避免地只能系于新生代身上。同时,更有一份作者深受西方基督文化中对孩子意象构筑的影响。圣经里就有这样的记载:门徒问耶稣,天国里谁最大,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站他们中间说,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模样,是绝不能进天国的。^[3]耶稣还对不让孩子接近他的门徒说:不要禁止他们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4]综上所述,孩子是泰戈尔理想世界的标本,以至于他会以哲思的高度与深度,写出如此充满虔诚与神圣的诗句: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把孩子作为理想、希望、未来的美好意象,以天使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中,尽管与中国传统尊老轻少的伦理思想格格不入,与“救救孩子”的五四新文化话语亦不尽相同,但却恰好吻合了20世纪初热衷接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人文精神,信奉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中国新文化潮流。腐朽没落的旧中国与其垂垂老矣食古不化的尊老伦理教条一起,被一心想赶上世界新时代、新思想、新潮流的青年们所唾弃。从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所体现出来的对青年品质的认识与讴歌,以及其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重大社会影响力,便可见当时社会思想之流向。陈独秀在为《青年杂志》创刊号所写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这样抒发道:“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

鲜活细胞之在人身。”^[5]以新生力量取代腐朽势力,以先进文明之青年改变落后封建之中国,往者固然已矣,未来则未尝不能建构在青年身上,故《青年杂志》之社告开宗明义: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可见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精英们心目中的青年形象的品质、功能与作用,已与泰戈尔笔下出现的孩子/天使意象是很一致的了。

二

认识了20世纪初中西合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运动背景,认识了冰心成长里所含有的中西文化合璧的家庭教养与基督教教育背景,认识了年轻的冰心对改变现实的理想与无措,便可理解为什么是冰心对泰戈尔文学中出现的孩子/天使意象的接受,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情感上,从认识上还是审美上,不仅是水到渠成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冰心几乎马上就在自己的写作中,全面地仿而效之了。

如《以诗代序》:我是一个盲者,/看不见生命的道途,/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走着跳着的引领,/一步步的踏入通衢。^[6]

无论是其取材于圣经的做法还是对其思想内容的诠释,无论是虚构现实还是寄托理想,无论是作为艺术形象还是修辞手段,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在冰心的笔下,一时间充盈的都是这活脱脱的泰尔戈版的孩子/天使意象,冰心也活脱脱成为一个既充满童心又对孩子情有独钟的中国版泰戈尔。否则,当年在美国的冰心,也不会以《寄小读者》这样的文本,把她的情怀源源不断地输送回给祖国的孩子。孩子/天使意象所内含的西方人本观与事物观,相对中国几千年来老生常谈的陈腐观念、主题与形象,不啻是一种别样的风气,它带给读者别样的审美刺激,而且也吻合当时以新桃换旧符的新文化思潮与价值取向。但从更隐蔽的角度来看,尽管这种意象源自西方基督文化的背景与理念,并不为中国读者所信仰,但它却暗合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本观。尊老袭旧的封建伦理观与秩序观,消弥了整个社会对孩子个体生命

的尊重乃至慈爱,但冰心引进的泰戈尔式儿童观,则激活起人们对“人之初”的审美意识,撩拨起人们久违的对“性本善”世界的关注与向往。

因此,看起来似乎大相径庭的中西儿童观,根底里却蕴含有一个古老而悠久的贯通与契合。年轻的冰心,就站在这个可以触动蒙尘已久的人心,引发广泛共鸣的沟通之桥上。这恐怕就是冰心何以能以一支纤纤弱笔,却可以在大腕林立男星璀璨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张伊始的文坛上,以其鲜明的有别于他的文学内涵与风格,四两拨千斤般地独树一帜,获万众瞩目的缘故。

在冰心的笔下,常常出现了这样的叙事与形象模式,即“天使孩子+世俗母爱”。前者表征未来,象征光明、洁净、快乐、无邪与希望,后者表征现实,象征苦难、忍耐、关怀、调和与拯救。如《世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二个在海边游戏的孩子对意欲轻生的凌瑜的拯救;《超人》中孩子禄儿对了无生趣的何彬的拯救;《最后的安息》中惠姑对翠儿的拯救……直到1957创作的《小桔灯》,里面身处窘境,却仍然用自制的小桔灯,温暖地照亮黑暗中前行的道,给人以生活的光明,信念的启示的小女孩,仍然是这个模式的不二演绎。小桔灯从当时不无粗砺的大跃进话语中非常另类地浮现出来,再一次奇妙地引发读者内心里久违的情愫,成为现代文学的又一个经典文本。

对冰心“孩子/天使+母爱”这个文学模式进行深入解读后,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它不计施爱者与受爱者之间的阶级、阶层、贫富、城乡等等人类最常见的差别、对立与隔膜。这个特点本身也是冰心在极其尖锐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能够用它来作为爱的哲学理念载体的原因。在她的构想里,只要是母爱就可以不计、也只有母爱才不计这些差别与冲突,跨越这种差别与冲突,抹平这种差别与冲突。而男女之爱的极致虽可感天地动鬼神,然其负面效应也同样路人皆知,它的狭隘性、偏激性、自我性,不具包容性,甚而还具有攻它性,使它无能代言冰心心目中的大爱。冰心所言之爱远远超越男女之爱的内涵与范畴,在天、在宇宙是神之爱,在地、在凡界只有母爱差可比拟。冰心把泰戈尔的“让他们望

着孩子/天使的脸,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他们爱你,因此他们能够相爱”(孩子的天使)的意思,几乎不露痕迹是演化为冰心式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超人)泰戈尔的孩子/天使就这样悄然植入母爱形象中,让天使意象与母爱功能奇特地融为一体,从此诞生出一个中国化了的爱之模式与爱之形象,以满足冰心的“调和”理念,同时它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与阅读期待。当时读者对冰心作品的热捧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二者之间的一拍即合。这也是为什么相对于大众来说苛严得多的批评家,一边觉得冰心笔下的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一边却不能不感叹她“描写儿童的作品却非常好”^[7]的缘故。

可见,冰心在文学中创造的这个形象模式,既吸纳了中西方文化中能够共通的某种有利因素,又揉合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中能够共通的某种有利因素,又应合了当时革故鼎新去弊扬利之时宜。其实这个现象本身也印证了冰心“调和”理念的成效。它虽然未必是疗救世人的神丹妙药,但却是那样熨贴了人们的心灵,如黑暗中的一点烛光,窒息中的一息清风,苦旱中的一滴甘露,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抚慰。加上她用新鲜的白话写成的美文,其作品不在坊间风靡一时那才怪呢。

三

但尽管如此,但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文学评论界与批评家们,无论是赞也好贬也好,都未能看到冰心这个文学模式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如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选家郁达夫,把冰心表现的这种无涉两性间情感的爱,一半归于她的还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一半归于她思想的纯洁,称之为是“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爱。^[8]语虽褒意,却也不很到位。受文学革命时期倡扬文学性与个性化美文思想的影响,郁达夫当时的选文标准,无疑偏向个性与优美。他入选冰心最明显的理由,一是出于冰心被公认的女性化“细腻优美”的文风,优美的白话文不仅对新文学的倡导有着积极推进作用,同时它也吻合

了文学革命提出的散文标准与现代文界时尚;二是出于她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及由此形成的不能被忽略的社会影响与声誉,因为“在中国的新文艺运动的前期,曾经给予当时社会以广大的影响,而‘几乎是谁都知道’”(《西滢闲话》)的女性作家,据我所知道的,那只有《超人》的作者——谢婉莹。”^[9]从郁达夫入选冰心的动机与理由来看,显然他还未能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挖掘出冰心写作的深刻意义与真正价值所在;他没能深入分析冰心现象所蕴含的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的时代文化信息。

但就是这样的观点,几乎代表了当时文界对冰心即使是出于欣赏的评价,而且影响深广,流风至今,几成定论。同时,也正是这种对冰心模式内涵认识不足所构成的浅表性解读与褒赞,反之导致当时乃至今日一些批评家对冰心写作意义的轻视。严厉者如蒋光赤:“好一朵暖室的花,冰心女士博得人们的喝彩!……我要嗤一声扫兴。本来暖室里的花何等可爱!但在现在的世界中,只有那无忧无虑丰衣饱食的市侩可以醉心于暖室的花……她的人生观是小姐的人生观……她与唐宋以上的小姐有什么区别?……若说冰心女士是女性的代表,则所代表的是市侩的女性,只是贵族性的女性。”^[10]蒋光赤非但看不出冰心与“唐宋以上小姐”的区别,却反而以其攻之;温和者则如陈西滢:“除了母亲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没有爱了。”^[11]中庸者如张天翼:“作品中显示了作者的女性,使你咀嚼到温柔、细腻、暖和、平淡、爱;作者也努力要使作品写成上述那味道,但这样,题材就似乎贫乏了。她的题材不外乎诗人、母性爱、天真、及人道主义。”^[12]即便是充分肯定冰心“毫无问题的,是新文艺运动中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的阿英,也仅是与成仿吾一样,看到的是冰心“真挚的心情,丰富的想象,诗人的天分”,并怀疑她“不绝如缕,乙乙欲抽”的“抒写的情绪”,此后也许没有新的有力的发展。^[13]难怪,当时即使被冰心散文《寄小读者》触景生情,感动得“曾偷偷地痛哭过几次”的读者,也不能不有这样的感觉:“冰心已过去了,已随着她的时代过去了,她,那个被大

众认为只能写‘海’写‘母亲’写‘星’的小姐派的冰心,听说年来已受够了四面恶意的拼击,现在已索性不再写什么了。”^[14]

冰心以明显不同于历史上女作家写男女情爱的文本特质,却能获得大众如此狂热的欢迎,批评界不仅对其文本没能做出切中肯綮的鉴识,而且也未能对此奇特现象做出深入而到位的分析,批评明显流于粗疏与浅陋,甚至意气。与其说这是受当时大多数批评者出于阶级立场与时代条件的局限,莫如说是他们对现代女性言说出现的新质与意义,缺乏对其识读与阐释的能力。被他们低估甚而不屑的冰心调和理念,以及反映在文学中建构的爱之模式,恰能印证后来美国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在她的著作《圣杯与剑》中所表述的“女性/圣杯”的文化特质。艾斯勒通过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组织系统的研究,认为与象征男权统治的“剑”文化所制造的战争、苦难和黑暗不同,“圣杯”文化带来的是和平与快乐。^[15]换言之,冰心模式就是女性“圣杯”式的文化特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冰心模式似乎是在无意间显现了女性本源的伟大的特征。

与郁达夫颇有共识的梁实秋,在谈到“现今著名的唯一女作家”冰心时,曾一反众议,特别指出冰心是一个优以散文的作家,而她备受“一班时髦的作家与批评家都趋之若鹜”的诗歌,却是“完全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16]这个观点颇有见地,但梁实秋亦未能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与发掘,更深刻揭示其优于古代女流作家既不能涉足亦非擅长的散文写作这一点,就已昭示冰心作为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但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冰心儿童观之于现代女性写作的意义。一是她所创造的“天使孩子+世俗母爱”的文学模式,表现出女性以人类为怀的大爱境界,这与历史上被困于闺阁之内,总以表现一己之私或以男女情爱见长的传统女性写作是绝然不同的,它一举突破了古代女性在文学写作中的传统模式,是体现女性文化与“圣杯”精神的文学典范。二是她以这种模式把现代散文所

特别注重的文学性,与自身写作理念做了堪称成功的揉合,使文本切合当时读者对文学阅读的新品味与新需求:西化、唯美、调和、新颖、现代感、理想化,不仅构成与古代女性文学绝然不同的艺术文本,而且也区别于近代以秋瑾为代表的政论性文本。在继秋瑾为代表的近代革命女性,用政论性文本打开女性写作通向社会公众的通道后,冰心以她的文学写作成功地让社会接受了女性作家的角色,打开女性作品社会化传播的缺口,这些都表征着中国女作家现代写作的转型与其特质。

注释:

[1]参见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有关张良的传说。

[2]参见鲁迅《狂人日记》,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后收入《呐喊》集,上海:北新书局1926出版。

[3]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

[4]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

[5]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青年杂志》一卷一号,见陈寿立《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页。

[6]冰心:《往事》——以诗代序,《往事》,上海开明书店1930出版。

[7]陈西滢《冰心女士》,《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

[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序。

[9]黄英:《谢冰心》,《冰心研究资料》,第197页。

[10]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冰心研究资料》,第193页。

[11]陈西滢:《西滢闲话》,《现代评论》1926年4月版。

[12]张天翼:《冰心》,《冰心研究资料》,第194—195页。

[13]黄英:《谢冰心》,《冰心研究资料》,第197页

[14]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第81页。

[15][美]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圣杯与剑》,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16]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原载《创造周报》第1集第12号,《冰心论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0000)

(责任编辑:陈建宁)